



再访鲁艺 那些嘹亮的抗战歌曲从这里唱响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目光扫过这些文字，您可能已经唱出声来。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一面写满抗战歌曲词谱的展板前，总有游客驻足，或低吟，或轻歌，神情肃然。
纪念馆所在的鲁艺旧址，是全民族抗战时期风云际会之地。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创办于延安的这所文艺学府，曾汇聚了冼星海、吕驥、郑律成、李焕之等一批音乐大家，《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等经典抗战歌曲诞生于此，唱响全国。

“这些创作于战火中的歌曲，是照亮人心的火炬，是驱散黑暗的黄钟大吕，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抵御外侮的斗志。”延安文艺纪念馆文研部文博馆员王红梅说。
彼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大批知识青年和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感召下奔赴延安。诗人何其芳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一批批来到延安城的人群中，有许多已经成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和戏剧家，他们为抗日文艺的发展聚集了力量。”鲁艺旧址讲解员王子亚说，为适应战时文艺创作和人才培养的需要，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
“我们相信：艺术不仅能唤起民众，而且可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头脑……”鲁艺成立宣言中的铿锵话语，很快成为现实。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王强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资料照片）

说，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而鲁艺正是这座“歌咏城”的中心，“在延安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鲁艺是音乐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今天的延安文艺纪念馆中，泛黄的照片、珍贵的文物，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展柜中，一支产自法国的铜质指挥棒引起关注，冼星海曾用它多次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这位曾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人民音乐家，是当年延安璀璨群星中的杰出代表。
1939年早春，延安西北旅社的窑洞里，诗人光未然深情朗诵着长诗：“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众中，冼星海猛然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写有长诗的纸张：“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简陋的窑洞中，冼星海用6天6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1939年4月，首演大获成功。周恩来曾为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自此，这部乐曲气势磅礴地回荡在大河上下。陕西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梦说，仅1940年，《黄河大合唱》就在晋察冀边区演出百余场，它以黄河寓意民族形象，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强音。
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一大批反映党的抗日主张、彰显民族精神、团结鼓舞人心的歌曲由鲁艺师生创作出来，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中发挥了强大作用，并影响至今。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拴平说，抗日烽火中，许多知识分子是听着《延安颂》从各地奔涌而来的，《生产大合唱》展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欣欣向荣。
与此同时，《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麦新、《游击队歌》的创作者贺绿汀等也先后来到鲁艺。人们耳熟能详的许

多抗战歌曲，都与鲁艺有不解之缘。
历史从未被忘却。今天，这些嘹亮的战歌仍在传唱。而在它们的诞生之地，先辈们也以各种鲜活的方式被铭记、被缅怀。
延安桥儿沟东山，当年鲁艺教员们的居住地。而今，这里依旧历史原貌复建起一孔孔窑洞，将之布置为冼星海、贺敬之、丁玲等文艺家的个体博物馆。
步入其中，马灯悬于墙面，文艺家的老照片、代表作等一件件展品，还原了他们在此生活工作的场景。而将目光拉远，一排排窑洞陈列于一道道梁枋上，颇为壮观。
近年来，鲁艺旧址如抗战中的灯塔延安，如磁石般吸引着人们。河北沧州游客张瑜手持相机，认真拍下每一张展板。“鲁艺师生上课的教室很简陋，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如此富足。”她动情地说。
文艺家们昔日绽放激情的热土，如今已成为弘扬爱国主义和传承延安精神的阵地。近10年来，延安文艺纪念馆共征集文物、史料和艺术品3万余件，一批临展、专题展走向全国；鲁艺旧址成立延安版画艺术中心，打造沉浸式思政教育实践基地，吸引10万余人前来采风、创作；《黄河大合唱》被编排进《延安十三年》《延安、延安》等红色演艺中，成为当地文旅品牌……
“在延安办学的7年半时间里，鲁艺开展了抗战歌咏、抗战戏剧、抗战文学等诸多活动，创作出一批不朽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从鲁艺走出的许多文艺家成为我国文艺战线的领军人物。”刘拴平说，在今天，更好地传播红色文化，让更多人从鲁艺的故事中汲取智慧、获得力量，是对先辈最好的致敬。

（据新华社）

传承红色基因 守护绿水青山——访辽宁宽甸革命老区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位于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天桥沟景区的杨靖宇将军雕像已迎来第一批瞻仰者。3米多高的雕像手持双枪、眼神坚定，凝望着群山——这里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根据地。
1934年开始，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在宽甸县天桥沟创建密营和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今，山林深处，20余处抗联遗址保存完好，仍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记者在一处密营遗址看到，这种名叫“地窖子”的密营分为上下两部分，探出地面的部分高约半米，真正的空间在地下，1.5米深的土坑设有炉火和土炕。
数十年过去了，岁月侵蚀了木头搭建的墙壁，只剩下外层一段段残破的石

壁。行至“鹰嘴砬子”下的瞭望哨遗址，视野豁然开朗，整片山谷尽收眼底，当年抗联战士就是在此监视敌军动向。
“当时这些密营多选在地势险要、靠近水源，进可攻、退可守的隐蔽之地。”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介绍，在原有根据地被破坏的情况下，这些密营为保存抗日武装实力、有效打击敌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杨靖宇建立起农村红色政权——四平乡政府。四平乡政府成立后，为抗联做了大量工作：筹集粮食、输送物资、侦察敌情、传送情报、护理伤员、为部队做向导等，配合抗联作战。
如今，按照四平乡政府原样修复的3间茅草屋里，陈列有杨靖宇将军穿过的衣服、佩戴过的物件、撰写的信件等。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空，耳边依稀响起震耳的杀声，眼前浮现杨靖宇率领战士们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
回望抗战烽火，今朝绿满山川。如今，宽甸人传承红色基因，挥动生态彩笔，描绘乡村振兴新篇章。
天桥沟景区着力融合自然生态与红色基因，游客沿着蜿蜒山道，可以在长达4000米的“红色旅游沟”中穿行，探访抗联野战医院、少年营、“杨洞”“杨泉”等遗迹，于苍翠青山与潺潺绿水间，触摸历史的厚重余温。
目前，天桥沟已成为集森林公园、滑雪场、特色民宿等于一体的生态康养度假胜地，为周边村民提供340多个工作岗位，季节性用工超1000人次。
紧邻天桥沟的黎明村，过去因为交通闭塞、基础薄弱，村民年均收入低。如何让乡亲们增收致富？宽甸县

从该村“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实际出发，以“公司+农户”模式，综合开发当地野山参产业项目。
如今，黎明村野山参基地种植面积达5万亩，野山参存苗量达1亿多株。村民还依托天桥沟旅游资源优势，近百户农民创办农家院、餐厅。村民崔树林和妻子不仅在天桥沟景区有稳定工作，同时经营农家院，还种植野山参，既能“吃租子”，还能“赚票子”。
宽甸的绿色蝶变远不止于此。长甸镇河口村三面环水一面傍山，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河口村人多地少、村民增收难的问题，当地政府引进燕红桃试种，逐渐扩大种植规模。经过多年发展，燕红桃产业已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河口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据新华社）

长征路上彰显建军初心的红军布告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极具标志性的革命文物——1935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件纵36.5厘米、横36厘米的油印文献，纸面虽历经91年岁月洗礼已微微泛黄，156字的六言韵文字迹依旧工整清晰、力透纸背。作为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长征”概念的历史遗存，这张小小的油印纸，不仅是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前的关键政治动员令，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的纲领性范本，承载着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的初心使命与建军根本。
这篇布告的诞生，源于中央红军

长征途中的生死抉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迎来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随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兵锋直指大渡河天险。此时的红军身处生死困局：前有川军重兵布防大渡河沿线，后有薛岳十万追兵紧逼不舍，蒋介石叫嚣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南岸。而横亘在红军与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近代以来，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阀、地方奴隶主的双重压迫，造成了彝汉民族间的深刻隔阂。
红军入境前，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红军烧杀抢掠”的谣言，煽动敌视情绪，红军前卫部队多次遭遇阻拦袭扰，甚至出现武器被抢、物资被扣等情况。面对这一局面，红军始终坚守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决摒弃旧军队“武力开路”的野蛮做法，选择用党的民族政策、严明军纪与真诚态度打破隔阂。这篇布告应运而生，为红军突破困局筑牢了政治根基与群众基础。
这篇短短26句的六言布告，看似是一篇战时安民告示，实则蕴含着人

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核心逻辑，其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早已超越时空，在多个维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篇布告彻底打破了旧政权文告晦涩生硬、官样文章的固有模式，采用彝族群众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六言韵文形式，将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革命宗旨，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通俗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布告中首次以正式文告形式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的重要表述，将此前的战略转移升华为有着明确政治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征程，赋予军事行动鲜明的政治属性，实现了政治引领与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布告开篇便亮明核心立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布告中的夷人、夷族即彝族）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第一次以公开文告的形式，面向少数民族群众作出的郑重宣示，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落到了实处。布告痛斥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的深恶罪行，郑重宣告红军“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付十足”的纪律要求，用最直白的语言划清了红军与一

切旧军队的根本界限。正是以布告宣示的民族平等政策为核心遵循，才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千古佳话。
布告不仅是安民告示，更是一篇面向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令。文中明确号召“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清晰阐明红军的革命目标，不仅是实现战略转移，更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它将红军的军事行动与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深度绑定，把战略转移的过程转化为宣传革命主张、动员人民群众、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正是依靠这种植根人民、团结人民的根本立场，红军才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这篇布告所确立的政治引领、民族平等、群众路线的根本原则，不仅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更为红军后续长征途中经过藏、回、羌等多个民族地区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深深融入了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
（据《学习时报》）

一枚石章

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四号展厅里，有一枚根据幸存者回忆复原的石章。两寸见方，青石质地，上面刻着八个字：“自珍自爱，再接再厉（厉）”。它的主人叫肖正纲。
肖正纲是湖南华容人，1925年入党，原名肖振纲，后改名“正纲”。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到万里长征，一路走了过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他在茂林地区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后被俘，押入上饶周田村集中营。入狱登记时，他报了假名：肖余生。几个老战友立刻心领神会：从“正纲”到“余生”，他是把整条性命都交给了党，定要和同志们硬扛到底。没过多久，他就和史进、陈德荣接上头，重新把支部建了起来。
周田村集中营是个苦工营，铁丝网上关着几百名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士兵。敌特白天逼着大家干重体力活，晚上轮番“上课”劝降。肖正纲悄悄把几个信得过的难友拢到一块，在劳动间隙，低声商量怎么把支部重新建起来。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现在是短兵相接的时刻，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识破敌人的阴谋。”

刻章的事，发生在一次上山劳作途中。肖正纲从周田村山坡上捡回一块石头，揣进怀里带回牢房。石头质地坚硬，颜色紫红。没有刻刀，他就找来一片断铁片，在昏暗的油灯下一下一下地凿。牢房里光线暗，他就凑到灯芯跟前；铁片钝了，他就用碎石重新磨刀。青石坚硬，每一下只能凿出一道浅痕，八个字分两列排布，第一列“自珍自爱”，第二列“再接再厉（厉）”，足足刻了十几个夜晚。刻完后，他把石章交给室友难友。难友们传看着它，摩挲着那些深浅不一的凿痕，没有人说话，却都懂它的分量。
1941年下半年，因叛徒出卖，敌特查实了肖正纲的真实身份。劝降的纸笔捧在他面前，他一言不发。特务中队长曾恭生拍着胸脯保证：“只要你承认共产党员身份，悔过自新，要官给官做，要钱给钱花。”肖正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新四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抗日爱国，无过可悔！”话音刚落，特务暴跳如雷，招来几个彪形大汉，抡起棍棒就打。直打得他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后来，敌人又把他押到茅家岭，他遭受了吊屋梁、站铁笼等酷刑，左眼被打瞎。
1942年6月，日军进逼浙赣线，集中营被迫向福建转移。6月17日，队伍行至崇安赤石镇时，第六中队发生暴动。未能脱身的肖正纲，于19日被押至虎山庙。就义前，他与同志们昂首挺立，领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划破长空，热血浸染大地。这位踏过万里长征的老兵，永远倒在了武夷山下，时年40岁。
那枚石章后来由难友带出，辗转交到肖正纲之子肖克武手中，后不幸在战乱中遗失。1979年纪念馆建馆时，依据当年幸存者的口述，重新仿制了一枚，陈列至今。
今天，来往的参观者在这枚石章前驻足凝视。“自珍自爱”，是对信仰与名节的坚守；“再接再厉（厉）”，是对革命必将胜利的坚信。志士虽逝，但这枚石章上凝结的革命精神将持续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向前。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溯源古人消暑法

夏日炎炎，暑气蒸腾，今人有空调、风扇、冷饮相伴，消暑纳凉更加便捷。在没有现代电器的古代，面对酷暑炙烤，古人凭借智慧与巧思，摸索出诸多消暑妙法，既取材自然，又雅致实用，在漫长岁月里，撑起一方清凉天地。
临水纳凉，是古人最朴素的消暑之法。古人深谙“近水生凉”的道理，常择河畔、池边、溪畔等地避暑。盛夏时节，文人雅士多临水而居，或临池静坐，或溪边漫步，清风拂水，凉意自生。东晋王羲之常与友人在兰亭溪水边曲水流觞，临水谈诗，借水意驱暑气；唐代诗人杜甫偏爱在江畔茅舍消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写尽临水纳凉的悠然。普通百姓则常在河边、井旁歇息，掬一捧清泉洗脸，坐于树荫闲谈，水汽氤氲间，暑气便消散大半。
筑室纳凉，尽显古人的建筑智慧。为避酷暑，古人建房极重通风遮阳，讲究“敞廊、疏窗、深檐、厚壁”。富贵人家建有专门的消暑居所，名曰“凉室”，墙壁加厚，窗户窄小，阻挡烈日直射，屋内搭建架空地板，隔绝地面热气。更有精巧的凉殿，以流水循环降温，唐代皇宫中的含凉殿，利用水力驱动水车，将冷水输送至屋顶，水流沿檐而下，形成水帘，风裹挟水汽灌入殿内，清凉如秋。普通民居则多开南北水窗，形成穿堂风，屋檐加宽，遮阳避晒，屋内摆放竹席、瓷枕，凉意顿生。
着夏衣、戴凉饰，是古人最直接的防暑妙法。古人夏日多穿麻、葛、纱等轻薄透气的衣物，宽松通透，散热吸汗，虽无华饰却清爽宜人。男子常戴凉笠、凉巾，女子簪戴茉莉、栀子花，既可遮阳，又添清香。市井百姓更喜赤足、敞襟，顺应时节，以最自然的方式散热避暑，既简约又实用。
食粥饮茶，为古人清暑养生之道。盛夏酷热，脾胃虚弱，古人便以清淡饮食消暑，常煮绿豆粥、荷叶粥、薏米粥，清热健脾、生津止渴；又喜饮凉茶，以金银花、菊花、薄荷、藿香煮水代茶，清暑解暑、提神醒脑。古人讲究不贪冰寒、温养清暑，既解酷暑，又护身体，是流传千年的养生智慧。
用冰消暑，自古便是消暑良方。古人藏冰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就设有专门官职“凌人”，负责冬季凿冰、储存，供夏日使用。他们在地下深挖冰窖，用稻草、糠壳隔热，将冰块封存其中，待盛夏取出使用。贵族人家会在室内放置冰盆，冰块融化吸热，降低室温，如同天然空调；宴席上则有冰盘、冰盏，冰镇瓜果、美酒，食之清爽解暑。宋代市井已有专门卖冰的商铺，冰雪冷元子、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等冷饮盛行，百姓也能尝得冰品凉意。古人用冰消暑，雅致又高效。
利用植物消暑，是贴近自然的消暑妙方。古人喜在庭院、窗前种植消暑植物，既遮阳又添凉。庭院中多植梧桐、柳树、芭蕉，枝叶繁茂，绿荫匝地；窗前摆放荷花、茉莉、薄荷、花香清雅，沁人心脾，薄荷叶片揉碎涂于肌肤，清凉止痒。古人还常采摘荷叶、竹叶，制作消暑饮品，荷叶粥、竹叶茶，皆是传统消暑佳饮，清热解暑，润燥养人。
利用器物消暑，藏着古人的生活巧思。夏日里，竹扇、蒲扇是家家必备的消暑器物，轻摇扇面，清风徐来，轻便又实用。瓷枕、竹席、藤椅更是消暑三宝，瓷枕冰凉沁骨，竹席、藤椅透气散热，坐卧皆凉。古人还会将瓜果、茶水放入竹篮，悬于井中用井水镇凉，取出食用时冰凉可口。
焚香消暑，以雅趣驱暑气。古人夏日常焚清涼香药，如沉香、檀香、藿香、冰片，香气清幽，宁心安神，正所谓“心静自然凉”。文人雅士在书斋焚一炉清香，临帖作画，读诸品茗，香气萦绕，暑意全无。这种消暑之法，不重物理降温，而重心境清凉，尽显古人的雅致情怀。
从临水筑室到藏冰用冰，从植物消暑到器物纳凉，古人的消暑之法，无一不取自自然，无一不藏着智慧。没有现代科技的加持，他们以巧思应对酷暑，在炎热夏日寻得清凉，活出闲适与雅致。这些古老的消暑方式，不仅是生活的智慧，更是传统文化的瑰宝，让今人在回望之际，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穿越千年的悠然与清凉。
（据《天津日报》）